

三位东洋“知华派”谈中日交往

——专访日本学者高原明生、川岛真、伊藤亚圣

“日中两国总算回到了可以一起谈经济建设的状态。对于稳固提升中日两国国民的彼此观感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尽量不要引发任何政治上的刺激性事件。”

文 | 本刊记者 胡万程



在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，从来不缺了解中国的人。他们懂得汉语，来过中国，了解中国，并通过工作途径去传播自身对中国的理解。

这样的人在日本被称为“知华派”。他们有的是外务省、经济产业省等政府部门及下属研究机构的涉华人员，有的是大学和民间企业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人员，还有的是活跃在日本媒体上熟悉中国事务的记者和撰稿人。

“知华派”多为社会精英，名校、政经法专业、中国通，是他们普遍的标签。有声望的“知华派”发出的声音，往往可以成为日本政府处理中国事务的重要参考。

不过“知华派”阵营也分不同类型，有的对中

国较为亲切，着力推动中日友好；有的则比较“鹰”一些，了解中国的同时，对于中国的警惕心也很强；也有的是根据中日关系的不同时期，审时度势判断发声的人。

时值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缔结40周年之际，《南风窗》记者请到了三位日本著名的“知华派”学者，让他们来聊一聊这40年来中日两国的交往故事，探讨当下中日外交的走向，再展望下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。

三位学者都来自东京大学，一位是法学院教授高原明生，著有《日中关系40年史》；一位是社科学教授川岛真，著有《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》；还有一位是主攻经济的副教授伊藤亚圣，著有《现代中

国的产业积累》。

如何回到正轨

南风窗：1978年之后，中日两国的关系经历了几个大的阶段？

高原明生：20世纪80年代是日中关系的黄金时代，日本的经济援助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贡献了重要力量，在90年代初欧美各国纷纷孤立中国的时候，日本率先解除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，并在1992年促成了天皇访华。

日中关系的第一个变化，是冷战终结后现有体制的崩坏带来的。随着中苏关系恢复正常，到1991年苏联解体，日中两国原来共有的“对抗北方威胁苏联”这一战略目标消失了，反之中国逐渐对日本的军费支出敏感起来，开始警惕日本成为“军事大国”。

日中关系的第二个转机发生在2004年，此时日中之间呈现“政冷经热”的状态，两国之间的领土纠纷、小泉参拜、日本对中国“和平崛起”的警惕，使得日中关系大幅度恶化。其后2012年政府间的冲突加剧，两国围绕着领土问题陷入了新一轮的危机，这应算作第三个阶段。

伊藤亚圣：从经济层面来看，第一个阶段是“亚洲改变中国经济”的1978-1989年，中国领导人先后访问了新加坡与日本，学习邻国的现代化与市场经济发展经验，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与经济援助。

第二个阶段是“中国融入亚洲经济”的1990-2000年，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，中国更为积极地加入了国际分工体制，东亚的生产网络逐渐建立。

第三个阶段是“中国开始改变亚洲经济”的2001年到现在，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，日中两国在制造业、软件等行业合作频繁，中国企业不断进入日

本市场，并购日本企业、雇佣日本人才，“中国效应”显著。

川岛真：日本对中印象从好变差，有三次转变。第一次转变是20世纪80年代末，关乎日本对中印象。第二次转变是2005年因小泉参拜爆发的反日游行，关乎日本国民对中感情。第三次转变是2012年因领土争端爆发的反日游行，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再度冷淡下去。

南风窗：据报道，中日两国政府正在以10月23日（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生效40周年纪念日）为目标，协商安倍晋三访问中国的安排，以此为契机中日关系有望回到正轨。如何看待安倍第二次就任首相后的一系列对华政策及其转变？

伊藤亚圣：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，伴随着自民党政权成立时期，2012年

安访问华会给日中两国带来在“日中、东亚、世界”议题上直接交流的机会，以此为由“或许”会达成一些共识。

中国国内的反日游行对于日中关系的影响非常大。第二次安倍政权成立的时点是2012年12月，这个时期是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国民对中观感最差的时候。受此影响，安倍政权想在对中关系上取得大的突破，舆论环境十分艰难。

2017年，安倍对中国的“一带一路”构想表示理解，出台了部分支持的方针，日中两国总算回到了可以一起谈经济建设的状态。但由于两国关系偏冷，现在是否能够达成新的共识，情况还不明朗。

川岛真：不是说安倍首相访华，日中两国的关系就会猛然变好的。安访问华会给日中两国带来在“日中、东亚、世界”议题上直接交流的机会，以此为由“或许”会达成一些共识。但如果认为访华就能改变一切，那是大

错特错的。

国际合作空间大

南风窗：在美国大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，中国与美国大打贸易战，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在加剧。在此局面下，日本将如何重新定位与中国的关系，对华外交将采取什么样的策略？

伊藤亚圣：现如今的美国对全球化的拒绝是显而易见的，它在持续减弱贸易自由化和移民对国内的影响。在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方面，中国政府需要继续解释自身在世界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。特朗普政权的政策变动大，未来难以预测，但日本政府努力推进自由公正的多边贸易体系的方向不会变。“TPP11”（指排除美国的11个原TPP成员国达成的新自贸协定）以及日欧EPA（“经济合作协定”，类似自由贸易协定）的缔结就是体现。

对于日本企业来说，担心的是因贸易摩擦而对亚洲生产网络产生影响。日本企业是以中国以及东南亚为中心设立“制造据点”而在国际上立足的，但如果贸易摩擦持续，这样的分工体制可能就需要重新编制。

在未来，“后全球化时代的日中关系”是日中两国需要着力考虑的。过去40年的日中关系以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、改革开放、制造业直接投资、亚洲生产网络以及全球化趋势为基础。但现如今，这股潮流本身正在自我排斥与调整。我们必须思考如何进一步巩固日中关系的成熟和稳定。

高原明生：关于特朗普政权对于中国所持的不满，日本和欧洲一样，既有认同的点，也有不认同的点。中国对于外资企业的种种限制以及技术转移的问题，是日美欧对不满的共通点。但是对于贸易赤字方面的问题，日中欧又